故宫学背景下的中国中古文物文献整理研究 *

王　素

内容提要　2023年是故宫学提出和创立二十周年。故宫学是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显学，不仅链接古今，而且贯通世界，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故宫学背景下，疏理这二十年间，中国中古文物文献整理研究的若干热点，以见故宫学的广博内涵和发展轨迹，揭示故宫学对中国学术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故宫学　石刻　石窟　长沙窑　长沙简牍　帝王像　《职贡图》

2023年是郑欣淼先生提出和创立故宫学二十周年。是年7月19日上午，笔者在厦门参加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数字文旅发展论坛，联系论坛主题“数字链接古今，网络贯通世界”回答主持人提问，特别谈到甲骨学、敦煌学、故宫学是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显学。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种种原因，大量的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故宫文物流散到了全世界，世界各国重要的博物馆、图书馆都有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故宫文物的收藏，甲骨学、敦煌学、故宫学不仅自然成为了“古今”之学，而且自然成为了“世界”之学。笔者还特别提示：殷墟甲骨流散始于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散始于1900年王道士开启藏经洞，与之相较，故宫文物流散始于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时间更早，也更具典型意义！因此，站在典型意义的角度，疏理这二十年间故宫学的发展轨迹，以及故宫学对中国学术的重要影响，就成为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

郑欣淼先生在多个场合都说过：“紫禁城（或故宫）是一部浓缩的中华5000年文明史。”[1]这是故宫学的精髓。因为故宫的历史，原本就不限于元明清三代[2]。在此之前，中国中古文物文献整理研究，也是

*　本文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木牍”（项目编号：G14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写作得到“万科—奉先殿研究性保护项目”资助。

‹1›　郑欣淼《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漓江出版社，2023年，第15页。郑欣淼就本书接受采访亦云：“故宫是一部浓缩的中华5000年文明史。”见陈俊珺《对话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读懂故宫的四重历史》，《上观新闻》2023年7月22日。

‹2›　翟晨旭《故宫里的中国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22年）从忽必烈初建元大都开始，将故宫的历史限于元明清三代，未免局促；张程《藏在故宫里的中国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从故宫藏品“红山大玉龙（中华文明的曙光）”说起，则得故宫学真谛。

极其值得关注的学术领域。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中国中古的时代划分，存在很多不同观点，笔者将中古音的存在时段，即东汉末年至宋元之交，作为中国中古的时代断限。在这个时代断限内，特别是在故宫学背景下，文物文献整理研究呈现不少热点。这里分三大类疏理如下。

一　石刻和石窟调查整理研究

马衡先生在谈“金石学之定义及其范围”时说[1]：

> 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凡与中国史有关者，谓之中国金石学。

按照马衡先生“大金石学”的观点，石刻固然属于金石学，石窟也是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衡先生作为著名金石学家，疏理故宫博物院从事石刻和石窟调查整理研究，最早自然非马衡先生莫属。但这已为人所熟知，可以无庸赘述。这里拟疏理的是故宫博物院开展石刻和石窟调查、整理研究的另一先驱陈万里先生的业绩。

陈万里先生(1892-1969)，江苏吴县人。他自幼兴趣广泛，早年从医，工昆曲，善绘画，还是著名的旅行家、摄影家。陈先生后来专研陶瓷，文献与考古并重，成为享誉世界的陶瓷大师和中国陶瓷考古学的奠基者。此外他还是中国近代石刻和石窟调查、整理研究的开拓者。今南京栖霞山，古名摄山，为南朝佛教圣地。向达先生1925年前往考察，介绍栖霞寺舍利塔“第六面释迦出城图”云[2]：

> 此面上方石额有近人陈万里题记二则，其一云：“北朝石窟如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巩县北邙、太原天龙，余均见之；南朝石刻，惟此山耳。甲寅三年一月由京到此，流连竟日。吴县陈万里。”又云：“此舍利塔尤精美，足以代表隋朝一代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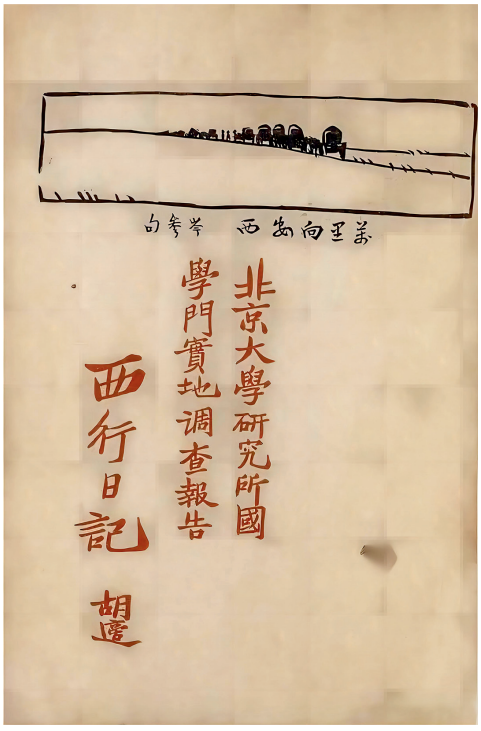
题记中的“甲寅三年”为1914年，是年陈万里先生年仅二十二岁，而在此之前，他已将北朝著名石窟，如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巩县北邙、太原天龙，考察了一遍。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具有这种眼光的学者尚不多见，称之为中国近代石刻和石窟调查整理研究的开拓者，洵不为过！而最为后人称道的，是陈万里先生早于张大千十六年到达敦煌，并将调查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其价值对于今之学术仍有重要影响，也为二十年间“故宫学”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1925年初，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华尔纳(Langdon Warner)等准备第二次经河西赴敦煌考察，为了工作方便，通过美籍加拿大人约翰·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介绍，邀请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派人协助，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考古学研究室主任马衡便派时任北大校医的陈万里参加。2月16日

‹1›　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上·绪论》，氏著《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页。

‹2›　向达《摄山佛教石刻小纪》，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0—451页。

〔图一〕陈万里《西行日记》封面



考察团从北平出发，经石家庄、太原、风陵渡、潼关、西安、咸阳、彬县、泾川、平凉、六盘山、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嘉峪关、安西到达敦煌，7月31日返回北平，历时五个半月，收获极其丰硕，后来整理出版了两部书：

第一部书原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西行日记》，胡适题耑〔图一〕，1926年出版。前有沈兼士、马衡、顾颉刚三序。沈兼士《序一》称："敦煌近廿年来外人已屡至其地，顾我国学者以考古为目的而往者，此殆为嚆矢。"又云："往昔载籍：录金石者，多乏山水之清音；写景物者，每略史迹之考订。两胜兼擅，厥维郦注《水经》；陈君兹记，殆足嗣响。"马衡《序二》称："同人以陈君此书，实为国人调查千佛洞者之第一次成绩，不可以不公诸海内。"并对书中所录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壁画题名价值予以专门评述‹1›。顾颉刚《序三》云："万里此行的目的，是到敦煌搜访佛教的艺术作品。……但就在这行道的五个多月中，所得的[其他]考古资料已经不少。如邠州（今陕西彬县）的大佛寺，泾州（今甘肃泾川县）的南石窟寺和丈八寺，兰州的金天观，安西的东千佛洞，以前的人多不甚注意，以致志书里留着许多错误。经万里这样实地调查了一下，辨明了方位，判定了年代，以后再有人去时，便可依据了这些材料而作更精密的考察了。"对本书价值有更为广阔的认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五位"大先生"：沈兼士长期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和文献馆副馆长、馆长；马衡任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更长达近二十年；陈万里也从1949年开始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研究部主任，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二十年；胡适、顾颉刚也与故宫博物院有着工作上的联系‹2›。将本书作为故宫学早期学术名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还必须强调的是，本书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一次实地考古调查报告，特别是第一次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的石刻和石窟调查整理研究报告，由于是最原始的记录，在很多石刻和石窟已经面目全非的今天，其价值更加得以显现。譬如本书四个附录：(1)《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保留了大量洞窟题记；(2)《泾川石刻校释及考证》和(3)《万里校碑录》保留了大量陇右石刻方面材料；(4)《官厅调查表卷》包括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安西东千佛洞三个石窟，分别列有洞数（即洞号）、洞高宽长、塑佛数、画壁完全与否、壁上画佛数、破坏尺寸、附记等项及数字。据此与原石刻和石窟进行比较研究，一

‹1› 马衡《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壁画题名跋》，原载马衡《陈万里〈西行日记·序二〉》，北京朴社初版，1926年，节录收入前揭氏著《凡将斋金石丛稿》，第315—316页。

‹2› 肖伊绯《胡适与故宫》（上）（下），《紫禁城》2015年第3、4期，第12—15、12—15页；许凯《顾颉刚与故宫博物院——兼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学者治学的差异》，《故宫学刊》总第十三辑，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393—399页。

定会有新的收获。本书近年日益受到重视，不断得到重编再版[1]，就是因为对于今之学术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之故[2]。

〔图二〕陈万里《西陲壁画集》封面



第二部书是名为《西陲壁画集》的摄影集〔图二〕，1928年出版。前有陈万里《卷头语》和马叙伦（夷初）《题词一》、陈衍（拾遗）《题词二》。顾颉刚《西行日记·序三》说："万里此行，摄影极多，大约有三百帧以上。"陈万里《卷头语》称"途中所摄各片"，由于种种原因，只能"先将壁画一部分"整理出版。故本书仅发表照片十八帧，分别为敦煌千佛洞第六、八八、一二〇洞画像和安西万佛峡第四、一一、三三、三六等洞画像以及瓜州口驿南破屋中残画等[3]。尽管发表照片不多，但陈万里作为中国对敦煌莫高窟开展摄影第一人，本书保存的是中国最早摄制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影像，价值之重要自是无庸置疑[4]。还有二百多幅照片一直没有公布，希望有关方面也能搜寻出来整理出版。

陈万里《西行日记·自序》曾叹曰："深以未获一游吐鲁番、横渡天山为憾！"可以断言，最早将吐鲁番与敦煌联系在一起的"大先生"，非陈万里莫属。他深感遗憾的未竟之业，几十年后，在故宫博物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苴弥缝。1930年，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考古，掘获124方高昌墓砖。1954年，国家文物局将这124方高昌墓砖全部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1959年，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开馆展览，从故宫博物院借去8方高昌墓砖，展览结束归还6方，留下2方，故宫博物院现藏122方高昌墓砖。我们知道，1931年，黄文弼先生整理出版的《高昌第二分本·专集》，由于种种原因，只发表了84方高昌墓砖图版。1951年，黄文弼先生整理出版的《高昌砖集（增订本）》，也仅从前揭84方高昌墓砖图版中选录了70方高昌墓砖图版[5]。即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高昌墓砖图版从未公布。2010年，郭玉海、方斌整理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

‹1› 陈万里《西行日记》，北京朴社初版，192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再版，2000年。选集收入陈万里《江山万里》，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全文先后收入[美]华尔纳著，姜洪源、魏宏举译《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附录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陈万里著，徐华烽、裘晓翔、吴明俊整理《陈万里日记（1916—1925）》，故宫出版社，2024年。

‹2› 张其遵《西行觅旧迹 古道探幽情———陈万里〈西行日记〉的史料价值》，《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1期，第70—71页；赵跃飞《陈万里〈西行日记〉里的民国大西北图景》（上）（中）（下），《档案》2013年第3、5、6期，第33—37、37—40、33—37页。

‹3› 陈万里《西陲壁画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28年。

‹4› 另参陈李鹏《"摄影得以艺名于中土将由此始"——陈万里摄影艺术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徐华烽、裘晓翔、吴明俊《陈万里：中国以摄影记录文物、博物馆的先行者》，"故宫出版"公众号，2022年5月14日。

‹5› 黄文弼编《高昌第二分本·专集》，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1931年；黄文弼编《高昌砖集（增订本）》，中国科学院考古学特刊第二号，1951年。

汇编》，刊发了66方高昌墓砖图版，其中有几方是首次刊发[1]。2022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的《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第一批）》，第293号为《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前，此书已被列入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2025年）献礼图书，其中有一册是《墓砖编》，即准备刊发故宫博物院藏122方高昌墓砖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2方高昌墓砖的全部图版。这不仅是完成陈万里先生的未竟之业，也是完成黄文弼先生的未竟之业。到那时，故宫博物院的石刻和石窟调查整理研究工作，才能说初步告一段落。

二　长沙窑和长沙简牍整理研究

谈到故宫博物院与长沙的渊源，很容易想到长沙窑和长沙简牍，其实，故宫博物院第四任院长张忠培是长沙人，也很重要。故宫博物院文物收藏分为二十五大类，陶瓷是其中一大类，陶瓷收藏有长沙窑瓷器自是不足为奇，奇的是长沙窑是故宫陶瓷专家最早认定和最早进行研究的。出土文献五大门类——甲骨、金文、简牍、文书、石刻，故宫博物院甲骨收藏量居世界第三，金文收藏量居世界第一，文书、石刻收藏也颇多精品，独缺简牍（仅有少量两汉封泥）。也许有人会认为，故宫博物院与简牍缺乏缘分。其实不然。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居延掘获的汉简，1931年运抵北平，最早是由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组织班子，进行开箱、拆包、清点、登记、编号、制卡、释文的，故宫博物院现存马衡捐赠物品中，还有两册马衡亲笔书写的居延汉简释文[2]。而自有关方面设立中国出版政府奖以来，简牍类书籍只有两种获得该奖：一种是《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获得第一届（2007年）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一种是《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至[玖]，获得第五届（2021年）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这两种简牍类书籍：前者由故宫博物院文献专家主持整理，后者由故宫博物院文献专家主持收官。当然，故宫博物院与长沙窑和长沙简牍的渊源还并不止此。

长沙窑是现在通称，唐名石渚窑[3]，1960年后名为铜官（镇）窑、望城（县）窑、瓦渣坪（地方）窑。1956年，湖南省文管会普查首次发现。1957年夏，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冯先铭、李辉柄两位先生受邀前往调查。1959年冬，冯先铭借在长沙工作之便，再次前往调查。冯先生稍后撰文指出，该窑应定名为铜官

‹1›　郭玉海、方斌主编《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按：该书有评介专文，见[日]气贺泽保规《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あわせて“所载资料目录”の绍介》，《东アジア石刻研究》第4号，2012年，第81－94页。

‹2›　关于马衡与居延汉简整理，另参王素《马衡先生与早期居延汉简整理研究》，待刊。

‹3›　今作石渚窑。按“渚”即“潴”，二字古代通用。晚唐李群玉，澧州（今湖南澧县）人，有《石潴》诗：“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另参周世荣《长沙窑见于〈全唐诗〉》，《中国文物报》1990年5月31日第4版。

窑，时代应定在唐五代间，产品性质以外销为主‹1›。这三点结论得到学术界长期肯定‹2›。长沙窑瓷器在唐代众多瓷窑中独树一帜：第一是突破了青瓷的单一釉色，釉下彩绘技法开始大量使用；第二是釉下彩绘题材广泛且内容丰富，涉及山水、人物、花鸟等，图像活泼生动具有写实感；第三是模印贴花工艺也开始大量运用，器物上大量出现使用褐彩题写的五、六、七言诗歌‹3›。因此，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长沙窑瓷器〔图三〕‹4›，还出版关于长沙窑的图书。周世荣先生主持编著的第一部关于长沙窑的图书，就是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5›。至于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他们对长沙窑瓷器的整理和研究从未停止‹6›。基于故宫博物院为长沙窑做出的重要贡献，2012年6月5日上午，湖南方面举行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仪式，特邀故宫博物院不同时期的三位院长——张忠培、郑欣淼、单霁翔共襄盛举，成为当日一道重要风景线‹7›。

〔图三〕唐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绘花鸟纹注子
故宫博物院藏



湖南是简牍大省，长沙是简牍大市。湖南出土的简牍，从楚简、秦简到吴简、晋简，各断代俱全，是国内唯一能够贯通整个简牍时代的省份。长沙出土的简牍，年代跨度也甚悠久，已经整理出版和正在整理出版的，就有五里牌楚简、仰天湖楚简、走马楼西汉简牍、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东牌楼东汉简牍、尚德街东汉简牍、走马楼三国吴简等多批(还有待整理的坡子街、青少年宫等地出土的多批简牍)，其中东牌楼东汉简牍由笔者主持整理，走马楼三国吴简由笔者主持收官。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是2004年4月至6月出土，共426枚，其中有字及有墨迹简牍206枚‹8›。最早为建宁四年(171)，最晚为中平三年(186)，主要属于东汉灵帝时期。笔者受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从2005年元月开始主持整理。此次整理，有两个首次：一个是首次根据形制与内容对这206枚简牍进行

‹1› 冯先铭《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到的几点收获》，《文物》1960年第3期，第71－74页。

‹2› 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第67－95页。

‹3› 徐俊《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校证》，《唐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96页。

‹4› 吕成龙主编《故宫经典：故宫陶瓷经典》，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50页，图39、图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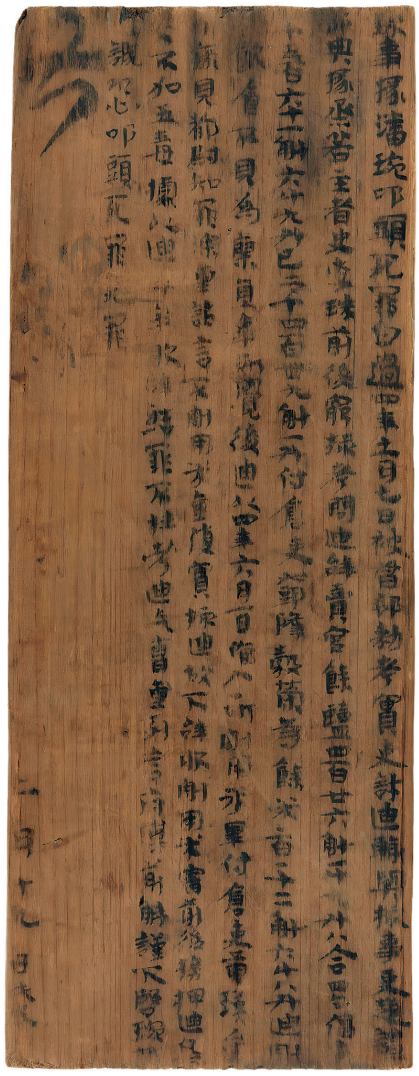
‹5› 长沙窑课题组(周世荣领衔)编《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6› 冯先铭等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李辉柄主编《长沙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李辉柄《略谈长沙窑瓷器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第70－77页；吕成龙《独具特色的唐长沙窑瓷》，《收藏》2011年第4期，第40－45页。

‹7› 张兴国《长沙铜官窑盛大开园 故宫三院长共襄盛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网站，发布日期：2012年6月11日。

‹8› 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概述》，原载《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69－77页，收入氏著《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131－144页。

〔图四〕长沙吴简“画诺”公文简
（左上角为“若”即“诺”字）



了精细的分类，共分公文、私信、杂文书、习字、残简五大类，前三大类下另分十五小类[1]；一个是首次根据性质与内容给每一枚非古籍类公私简牍定名，名称最长有廿九字，如《光和六年(183)监临湘李永、例督盗贼殷何上言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名称最短也有二至四字，如《残简》《纪书信》《陈某残券》等。还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传世文献记载，中国的文字书法，在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发生大的变革，篆、隶、章草衰落，行、楷、今草兴起，过去缺乏出土文献印证，长期不能讲述清楚，东牌楼东汉简牍的出土，解决了这一问题。我们为此先后整理出版了两部书：一部是包括发掘报告在内的简牍著录书，一部是隶、草、行、正四体加习字简的书法艺术书[2]。这两部书的整理出版，为简牍整理树立了一个标杆，促进了东汉末年历史文化和文字书法的研究。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是1996年10月至11月出土，共14万枚左右，其中有字简就有近8万枚，超过当时全国其他省市出土简牍的总和，仅此就轰动了国内外。吴简的年代，最早起始东汉建安五年(200)，最晚讫止孙吴赤乌元年(238)，总体属于三国时期。而中国的断代史研究，三国史最为薄弱，传世文献大致只有一部《三国志》，出土文献过于零散难堪大用，故长沙吴简的出土，为三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原始材料，最让学术界振奋。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副组长，最早来到长沙，实地考察了走马楼考古工地，详细询问了发掘情况，完整检查了发掘资料，对新出吴简的重大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保护和整理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张忠培先生原本就是长沙人，在长沙读完中小学才赴北京读大学，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对吴简的关心更胜于一般考古学者[3]。在他的建议下，很快成立了整理组。同时，研究工作也已展开。笔者发起的涉及典章制度的学术讨论，被称为“学术界一道靓丽风景”[4]，其第一个景点——“画诺”问题〔图四〕，更引起各方持久关注[5]。

‹1› 简牍分类始于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上虞罗氏宸翰楼印本，1914年)，但仅分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大类，前二大类下另分九小类。

‹2›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刘涛、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书法艺术》，文物出版社，2010年。

‹3› 王素《知謇謇之为患 纷忳忳之愿忠——深切缅怀张忠培先生》，原载《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怀念卷》，故宫出版社，2018年，第152—160页，收入氏著《师友自相依》，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03—217页。

‹4› 王琦《十五年来长沙走马楼吴简研究进程综述》，《群文天地》2012年第2期下，第191页。

‹5› 王素《“画诺”问题纵横谈——以长沙汉吴简牍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1期，第121—136页。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预计整理出版十二卷三十四册，包括《嘉禾吏民田家莂》一卷二册，《竹简》十卷二十九册（[壹]至[玖]和[残简]），《竹木牍》一卷三册。其中，笔者主持整理了七卷二十册，包括《竹简》[壹]、[叁]、[柒]、[捌]、[玖]、[残简]和《竹木牍》，为走马楼三国吴简整理的完美收官贡献了力量。

此外，还有两件事，说明故宫博物院与长沙简牍整理研究确有深厚关系，值得在此提及：

一件是2016年8月27至28日在长沙召开“纪念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二十周年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在长沙吴简研究史上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此次会议由故宫博物院、湖南省文化厅、长沙市人民政府主办，长沙简牍博物馆、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承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韩国庆北大学人文学术院等十余家单位协办。来自中国（包括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美国等国的一百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单霁翔院长代表主办方在开幕式上致辞，张忠培先生代表主办方致闭幕词。张先生的闭幕词名为《希望家乡成为简牍的强市、强省》[1]。他表示：自己出生于长沙，与湖南有着浓浓的乡情，与长沙吴简、里耶秦简、益阳兔子山简牍这三次湖南地区重大简牍发现有着特殊的缘分。张先生对这次学术研讨会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学术质量优良、实现了实事求是学风和朴实无华的文风以及严肃认真、齐放争鸣及学术自由的会风的高端的学术研讨会。”他多次强调，期待通过人才保障，学术与研究各方面水平的提升，使自己的“家乡实现由简牍的大省、大市向简牍的强省、强市的转变”。

另一件是2019年6月25日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先生亲赴长沙为故宫研究院“长沙简牍研究中心”揭牌。同时，由长沙简牍博物馆编著、笔者和长沙简牍博物馆原馆长宋少华担任顾问、西泠印社出版的新书《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在现场举行首发式，标志故宫博物院与长沙简牍博物馆新的合作正式开始。湖南省文物局、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出席了揭牌仪式和新书首发式。这两项活动成为当日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文化盛事。

三　帝王像和《职贡图》整理研究

近人喜谈“以图证史”[2]。故宫博物院文物收藏分为二十五大类，绘画是第一大类，“以图证史”无疑属于故宫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里所谈“帝王像”，包括两种：一种是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传为唐阎立本绘《古帝王图》卷。该图异名颇多，北宋称《帝王像》，南宋称《列帝图》，因绘有西汉至隋十三位帝王，故又名《十三帝王图》或《历代帝王图》。北宋曾藏秘阁，南宋钤有“中书省印”五处，证明曾为宋代宫廷收藏。另一种主要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南薰殿帝王像》。该像从伏羲到明朝诸帝多达数十幅，为前明宫

‹1› 张忠培《希望家乡成为简牍的强市、强省》，《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纪念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二十周年）》，中西书局，2017年，第8—14页。

‹2› 但须慎重。参阅缪哲《以图证史的陷阱》，《读书》2005年第2期，第140—145页。

〔图五〕唐阎立本（传）《古帝王图》之吴主孙权立像
波士顿美术馆藏
采自朱梦溪《中古麈尾及其图像研究》，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4页



廷不同时期摹本[1]。还有一种《职贡图》，原本各个王朝都有，但限于篇幅，这里只谈梁元帝《职贡图》。该图原有三个有图摹本，清官修《石渠宝笈》《石渠宝笈续编》先后著录，均为清宫旧藏，现在仍有两个有图摹本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这三种图像自与故宫学密切相关。

《古帝王图》卷所绘为汉昭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蜀主刘备、吴主孙权、晋武帝司马炎、陈文帝陈蒨、陈宣帝陈顼、陈废帝陈伯宗、陈后主陈叔宝、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十三位帝王，其中魏文帝曹丕以降十一帝均属中古时代帝王。该图是否唐阎立本所绘，一直存在争论。金维诺先生不少论著都涉及该图。他在《阎立本与尉迟乙僧》中说："《历代帝王图》揭示了阎立本在肖像画方面的杰出水平。"又在《〈古帝王图〉的时代与作者》中说："《古帝王图》并非出自阎立本之手。"[2]前后判断大相径庭，说明作者确实难以考实[3]。但并不妨碍该图作为宫廷绘画进行研究[4]，而且一直是研究热点[5]。画中很多"以图证史"的典型，譬如吴主孙权图像，孙权右手拿的器物是"麈尾"〔图五〕。麈尾是古人闲谈时执以驱虫和掸尘的一种特殊用扇，盛行于六朝时期，属于名流雅器，往往随身携带，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晋陶潜（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庾）亮以麈尾掩口而笑。"李白《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诗："黄金狮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谈重玄。"麈尾实物仅日本正仓院藏有二柄[6]，图像则以《古帝王图》卷之吴主孙权图像为第一[7]。

‹1› 蒋复璁《"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南薰殿图像存佚考》，原载《故宫学术季刊》第8卷第4期，1974年，收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76页。

‹2› 金维诺《阎立本与尉迟乙僧》，原载《文物》1960年第4期；《〈古帝王图〉的时代与作者》，原载香港《美术家》，1980年。收入氏著《中国美术史论集》上卷，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156－170、180－185页。

‹3› 金维诺稍后访问波士顿美术馆，亲见该图，还与馆长方腾当面讨论"《古帝王图》补绘者的画蛇添足"问题。见金维诺《访问波士顿——欧美访问散记之二》，《美术研究》1982年第1期，第79－81页。

‹4› 陈葆真《图画如历史：传阎立本〈十三帝王图〉研究》，原载《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6期，2004年，第1－48页，改名《图画如历史：传阎立本〈十三帝王图〉和相关议题的研究》，收入氏著《图画如历史：中国古代宫廷绘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

‹5› 参阅沈伟《波士顿藏（传）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研究》，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弘毅《（传）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研究》，《中国书画》2014年第6期，第44－50页。

‹6› 王勇《日本正仓院麈尾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Z1期，第205－209页。

‹7› 朱梦溪《中古麈尾及其图像研究》，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按：本文附录"麈谈——中古麈尾文化意象展"策展方案，所列"展品清单"，第一为日本正仓院实物，第二即为《历代帝王图》之吴主孙权图像。

〔图六〕《南薰殿帝王像》之北宋仁宗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美]方闻著，郭建平译《宋、元、明时代的帝王画像》，《艺术百家》2008年第4期，第6页



《南薰殿帝王像》所绘为伏羲、帝尧、夏禹、商汤、周武王、梁武帝、唐高祖、唐太宗、后唐庄宗、宋宣祖(赵弘殷)、宋太祖、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宋理宗、宋度宗、明太祖、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明宪宗、明孝宗、明兴献王(朱祐杭)、明武宗、明世宗、明穆宗、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近四十个帝王，除了宋、明比较完整，其他各个王朝多有残缺。其中梁武帝至宋度宗十九帝王均属中古时代帝王。这批图像，除了前揭帝王，还有皇后图像，原存清内务府库，乾隆十二年(1747)发现，尘封蛀蚀，不无侵损，高宗弘历命令补缀重装，改置南薰殿供奉[1]。南薰殿原本就是明代建筑，在紫禁城外朝西路，断虹桥西南，武英殿西南不远，是一处独立院落，十分幽静，故这批图像保存完好。民国年间就经常拿出来展览[2]。其主要部分后来全部迁台，台北故宫博物院也经常拿出来展览，2021年还举办过“权力的形状——南薰殿帝后像特展”。中国古代写“御容”供奉有悠久传统。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神品下》说：“阎立本……与兄立德齐名于当世，尝奉诏写太宗御容。”又《妙品中》说：“陈闳……明皇开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写御容，冠绝当代。”因而这些帝王图像，都属于“写真”摹本，极其宝贵。譬如宋仁宗图像〔图六〕。中国古代庙号为“仁宗”的皇帝有六位：宋仁宗、元仁宗、辽仁宗、夏仁宗、明仁宗、清仁宗。只有宋仁宗当得起这个“仁”字。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经历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九个年号，是两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宋仁宗勤俭持家，仁慈宽厚，在位时期，名臣名将辈出，如吕夷简、范仲淹、包拯、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狄青、韩琦等，共同创造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的“仁宗盛治”。方闻说：文献记载宋仁宗是“一个英明而慈悲的男人”。从南薰殿图像看，他“穿着灿烂的朱红色袍子，

‹1› 赖毓芝《文化遗产的再造：乾隆皇帝对南熏殿图像的整理》，《故宫学术季刊》第26卷第4期，2009年，第75—103页。

‹2› 黎晟《清宫南薰殿图像考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年第6期，第68—76页；黎晟《民国时期南薰殿图像播迁、存佚考》，《美术观察》2018年第9期，第105—111页。

外貌纤弱，同时从面部表情出透漏出敏感的气质，与太祖相比，仁宗的品性是谦虚和仁慈的。”[1]佛教讲“相由心生”，南薰殿宋仁宗图像反映的正是内在与外在相统一的真实的宋仁宗形象。

梁元帝《职贡图》的三个有图摹本：

第一个是唐阎立本摹本，原名《唐阎立本王会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依次绘虏、芮芮、波斯、百济、胡密丹、白题、靺（末）、中天竺、狮子、北天竺、渴盘陀、武兴、龟兹、倭、高骊、于阗、新罗、宕昌、狼牙修、邓至、周古柯、阿跋檀、建平蜑、女蜑二十四国与蛮族使者立像，无题记。

第二个是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本，原名《梁元帝蕃客入朝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纸本白描，依次绘鲁（虏）、芮芮、河南、中天竺、佚名、为、林邑、师子、北天竺、渴盘陀、武兴蕃、宕昌、狼牙修、邓至、波斯、百济、龟兹、倭、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题、临江蛮、佚名、高丽、高昌、天门蛮、建平蛮、滑国、于阗、新罗、干陀、扶南三十三国与蛮族使者立像，无题记。

第三个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摹本，原名《唐阎立德职贡图》，先为南京博物院藏，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绢本设色，依次绘写滑、波斯、百济、龟兹、倭、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十二国使者立像与十三国题记（倭与狼牙修之间有宕昌残题记，无图像）。

此外，2011年赵灿鹏公布了一个新发现的无图摹本[2]，即清末民初人葛嗣浵（1867-1935）记录的清张庚（1685-1760）乾隆四年（1739）摹本《诸番职贡图》卷[3]。但葛嗣浵仅依次记有渴槃陀、武兴蕃、高昌、天门蛮、滑、波斯、百济、龟兹、倭、高句骊、于阗、斯罗（新罗）、周古柯、呵跋檀、胡蜜檀、宕昌、邓至、白题十八国与蛮族题记，无图像。

清张庚摹本题记公布后，国内外掀起一个研究梁元帝《职贡图》的热潮，这个热潮一直持续到现在，成果很多，最重要的是一个会议和三部论著。

会议是2012年1月21日在日本东京国学院大学召开的“国际シンポジウム（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梁职贡图と倭——5・6世纪の东ユ-ラシア世界”。这是关于梁元帝《职贡图》研究的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这个会议在清张庚摹本题记公布不到一年召开，显示日本学者对新材料的敏感。会议代表来自中、日、韩三国，笔者是中国唯一特邀代表。会议由著名学者佐藤长门、铃木靖民主持。正式报告五人，依次为：（1）王素（故宫博物院）《梁职贡图と西域诸国》；（2）李成市（早稻田大学）《梁职贡图と朝鲜诸国》；（3）金子修一（国学院大学）《中国南朝と东南诸国》；（4）新川登龟男（早稻田大学）《梁职贡图と佛教》；（5）广濑宪雄（爱知大学）《中国王朝と倭と东部ユ-ラシア世界》。再次发表三人，依次为：（1）河上麻由子（日本学术振兴会）《梁代の对外交涉と佛教》；（2）赤羽目匡由（早稻田大学）《新出〈梁职贡图〉逸文

‹1› ［美］方闻著，郭建平译《宋、元、明时代的帝王画像》，《艺术百家》2008年第4期，第6页。

‹2› 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的新发现》，《文史》2011年第1辑，中华书局，2011年，第111—118页。

‹3› （清）葛嗣浵《清张庚〈诸番职贡图卷〉》，《爱日吟庐书画续录》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0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线装书局，2002年，第546—549页。

の朝鲜关系记事を巡るコメント》；(3)尹龙九(仁川都市公社)《〈梁职贡图〉の流传と摹本》。参加会议者多达四五十人，窪添庆文、气贺泽保规、石见清裕、片山章雄等著名学者都来了。这在以开小会著称的日本，算是大会了。

第一部论著是铃木靖民、金子修一主编的《梁职贡图と东部ユーラシア世界》[1]。这是前揭会议论文集的扩充版。内分三个专题，共十八篇论文，加上前言(金子修一)、解题(尹龙九)(含清张庚摹本题记全部图版)、后记(铃木靖民)，堪称蔚为大观。第一个专题名为"东部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构造"，包括铃木靖民、王素、石见清裕、中村和树、金子ひろみ、新川登龟男六篇论文；第二个专题名为"テキストとしての职贡图"，包括尹龙九、深津行德、泽本光弘和植田喜兵成智、片山章雄四篇论文；第三个专题名为"梁と'蕃夷'の国际关系"，包括河内春人、菊地大、广濑宪雄、河上麻由子、李成市、赤羽目匡由、堀内淳一、金子修一八篇论文。这部论著极其重要，因为从名称看，已经不提传统的"东亚世界"，而直称"欧亚东部世界"，希望以"欧亚东部世界"取代"东亚世界"的意图十分明显，反映了日本学界关于中古国际秩序与地缘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

第二部论著是米婷婷《梁元帝〈职贡图〉基本问题新探》[2]。综观几十年来梁元帝《职贡图》的研究，探讨的都是一些高大上问题，其实很多基本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米婷婷的这部论著，虽然只是一部尚未正式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但探讨的都是基本问题，令人耳目一新。全文分六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选题的内容与意义，根据研究史梳理所见趣向，提出关于梁元帝《职贡图》尚须探讨的基本问题。第二章"梁元帝《职贡图》的形成"，第三章"梁元帝《职贡图》现存四摹本的源流"，第四章"梁元帝《职贡图》传世文献所见六摹本"，第五章"梁元帝《职贡图》收录国名诸问题"，则都是关于梁元帝《职贡图》基本问题的新探讨。第六章"结论"，从创新点的形成、疑难点的推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三个方面，对本文进行全面总结，明确了本文的创新点、疑难点与遗留问题，为今后对梁元帝《职贡图》基本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种"卑之无甚高论"，从基础研究做起的学风和文风，值得大力提倡！

第三部论著是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释文校证》[3]。该书做的也是梁元帝《职贡图》的基础工作。全书正文分六部分：(壹)"北宋摹本题记释文"；(贰)"清张庚诸番职贡图卷题记校释"；(叁)"职贡图题记佚文辑校"；(肆)"序赞"；(伍)"梁职贡图疑伪一种"；(陆)"历代书画著录题跋资料辑录"。还有两个附录和两个索引。附录：(一)"南北朝交聘史事系年汇证"；(二)"南朝外域朝贡史事编年"。索引：(一)"南北朝交聘使节人名索引"；(二)"南朝外域朝贡国名索引"。另加一篇长达将近五万字的《前言》和梁元帝《职贡图》三个有图摹本全部原大彩色图版，美轮美奂，厚重无比。可以认为，研究梁元帝《职贡图》，本书是必须置之座右不可或缺的论著。

‹1› ［日］铃木靖民、金子修一编《梁职贡图と东部ユーラシア世界》，东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4年。

‹2› 米婷婷《梁元帝〈职贡图〉基本问题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

‹3› 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释文校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图七〕唐阎立本（传）《职贡图》之“虏国”（东魏）使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释文校证》“附彩版图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图八〕南唐顾德谦（传）《职贡图》之“为国”（西魏）使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释文校证》“附彩版图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此外，还有一篇论文值得一提。这就是罗丰先生《邦国来朝——台北故宫藏职贡图题材的国家排序》[1]。我一直认为：南北朝时期，南方对于北方半壁江山，《宋书》有《索虏传》，《南齐书》有《魏虏传》，《梁书》没有北魏或东魏、西魏传记，是不完整的。而梁元帝《职贡图》应该是有东魏、西魏二国使者图像与题记的。唐阎立本摹本有“虏国”使者图像〔图七〕，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本有“鲁（虏）国”使者图像，大家都认为就是东魏使者图像。既然有东魏使者图像，那么就一定有西魏使者图像。然则，西魏使者图像在哪儿呢？罗丰先生认为就是南唐顾德谦摹本第六图的“为国”〔图八〕。他说：“‘为国’装束同汉式，或为‘伪国’或西魏国，南朝称北朝为‘伪’。‘为’、‘伪’、‘魏’的中古音十分接近，差别细微。”这是一个大胆合理的推论。记得几年前，葛兆光先生曾云：“有趣的是，在《职贡图》中，观念的异邦，却不包括北方的鲜卑魏。”[2]意思说梁元帝《职贡图》没有北魏或东魏、西魏使者图像，显然失察。

综上可知，故宫博物院作为综合性博物馆，文物文献收藏种类繁多，与中国中古学术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宫学作为综合性学问和学科，是中华学术文化重要载体，也涵盖了中国中古文物文献整理研究主要领域。我相信，在故宫学背景下，中国中古文物文献整理研究，一定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责任编辑：谭浩源）

‹1› 罗丰《邦国来朝——台北故宫藏职贡图题材的国家排序》，《文物》2020年第2期，第41—55页。

‹2› 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页。